

高明編著

古陶文彙編

中華書局

古 陶 文 彙 編

高 明 編 著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

787 × 1092毫米 1/32 印張4 插頁

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,001 — 1,000冊 定價: 121.50元

ISBN7 — 101 — 00659 — 0 / H · 58

出版說明

古陶文研究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，但是對古陶文的研究較之甲骨、金文，却要落後一些。原因有二：一是資料難找：自清代陳介祺開始著錄陶文以來，已經一個世紀了。雖然各家所輯的陶文拓片集已有二十餘種，但真正刊行問世的不過是《鐵云藏陶》、《季木藏陶》等二、三種而已。這就給古陶文的研究帶來了不便。二是文字難認：戰國陶文多不合六書，且工匠刻印有時隨意增減筆劃，這又給古陶文的研究增加了難度。

近年來，由於戰國文字資料的不斷大量出土，學術界對戰國文字的研究已經有了極大的進展，相應地古陶文的研究也日趨活躍，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績。《古陶文匯編》一書就是為了適用這種新情況而編成的。

本書共收集各種古陶文拓片二千六百二十二張，舉凡前此成書的陶文拓片集（不論已刊或未刊）和建國後新出陶文，絕大部分均已匯集于此。本書分省著錄所收戰國陶文拓片。商代、西周陶文雖非戰國文字，然實是後者濫觴，故置之卷首。山東大汶口陶文，其意義尚待進一步研究，故置於書後以為附錄。其資料之豐，體例之善，均有超過前人處。

我們希望，本書能給學術界提供一份較全面的古陶文資料，以推動古陶文研究的進一步發展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七年七月

古陶文彙編李序

陶文研究一向是古文字學園地中比較冷清的角落，有關論著的數量非但比不上甲骨、金文，甚至不及泉幣、璽印等門類。實際上，自晚清以來，陶文的發現相當豐富，內容也很重要，祇是材料大部份沒有出版，流傳稀少，以致學者難於着手。高明同志長期重視這項珍貴材料的蒐集，經過精心整理，纂成《古陶文彙編》，是迄今最完備的陶文總集。可以預見本書的問世將使陶文的研究全然改觀。蒙高明同志命我為《彙編》寫幾句話，我感到深深的欣幸。

細讀《彙編》，竊以為有兩個突出的優點，一是收羅的宏富，二是體例的美善。

陶文材料繁多而且零散。最早鑒定和收藏陶文的是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。據我們見到的陳氏手跡，他開始訪獲陶文在清同治壬申，即公元一八七二年。這比甲骨文的鑒定早二十七年，距今已一百一十五年了。陳氏所藏為數甚多，其在世時傳拓的《簠齋藏陶》據稱全套共四千零四十三紙，現今能看到的若干部，件數多寡不一，互有出入。陳氏藏品最後尚不止此數，聽曾在 一九三七年夏為北平圖書館洽讓萬印樓陶文的謝國楨先生談，當時所見約四千八百件。一個世紀中間，還有好多名家收藏陶文，大多沒有整套拓本傳留，有的也成為珍本，甚或以零張傳世。印刷出版的祇有《鐵雲藏陶》、《夢庵藏陶》、《季木藏陶》等幾種。中惟周季木氏所藏為多，曾見其詳單雲有一千二百一十二件。由此可見，陶文的輯集殊非易事。

《彙編》採用的拓本，許多是一般讀者無法見到的。僅《簠齋藏陶》就有好幾部。高明同志自藏的拓本更有不少前人未見的異品。更重要的是《彙編》收入了很多有明確出土記錄的新材料。過去發現的陶文雖然數以萬計，也有發現地點的傳說，如臨淄、易縣等等，但究非考古發掘所得，其間難免傳誤，在研究上有所局限。近年新出的發掘品，具有更高的科學價值，同時出土範圍大為擴展，在衆所周知的齊、燕、秦等國陶文以外，又開拓了新的眼界。這些發掘品也為進一步鑒別前人著錄的材料提供出可靠的依據。

以往陶文著錄，多循金石書籍慣例，首列片大字多之品。本書則區別時期和地域，加以整理排列，眉目劃然，是體例上一大特點。再有陶文多數是在陶器上鈐印而成，不免

重複過去著錄有時件數雖多，文字却嫌重複。本書細心汰選，又注意到文字結構變異、布局行款以及陰陽正反等差別，使有限篇幅中能包容各種類型的材料，為讀者的便利費了很大功夫，是我們應向編者表示感謝的。

《彙編》收錄的陶文，很多非常重要，這裡不能詳細介紹，祇略述一二，以見一斑。

首先是早期陶文。前人陶文拓本，每稱三代，所獲實以戰國時物為主。《古陶文彙錄》、《陶文編》兩書兼及更早的材料，然當時發現的數量還不很多。《彙編》廣收近年考古發現，增加了許多早期陶文。編者根據一九八四年發表的論文《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》，將上限斷自大汶口文化陶文，這一見解和多數學者是一致的，有的外國學者也持類似意見（如美國鮑

則嶽先生一九八六年在《世界考古學》刊出的《古代中國文字》一文。

其次是田齊的大璽陶文，就是用形製較大、文字較多的璽鈐印而成的一種陶文。這種陶文絕大多數是陽文，文例往往以某地某人立事起首，內容有特殊意義，為學術界所重視，然而數量較少。五十年代時我就試作統計，由於聞見狹陋，所得不及三十種，後來在各家拓本里又看到一些，還是不多。《彙編》在這方面有不少珍奇材料，很值得研究，請讀者不要錯過。

齊國的刻劃陶文，也頗少見。本書所載，例如三·六，除鈐蓋有“華門陳棱……”大璽之外，還刻有“齊右”二字，字與齊刀相同而更雄肆。像這樣饒有興味的材料，書中還有許多。

再有燕國的紀年陶文。這種陶文係用燕國特有的長條

形璽印成，過去所見有十七年八月、廿一年八月、廿二年正月、廿三年三月等，職官工匠人名可互相聯繫，其間有幾例是在燕下都遺址發現的。現在《彙編》所收，又添加了不少例子，相當一部份是燕下都的出土品。其紀年由十六年至廿二年，人名和前此著錄的也能聯繫起來。這些新材料對研究燕的製陶業無疑有很大價值。

還要提到秦陶文。秦陶文出現甚早，陳介祺、吳大澂均曾收藏，陸增祥《八瓊室金石補正》也有記述，但其數極少。後來搜集較豐的，應推陳直先生。秦陶文的大量發現是在近年，本書所錄品種繁多，為過去著錄所不及，而且多有出土地點可徵。

高明同志多年在北京大學講授古文字學，所著《古文字

學講義》、《古文字類編》皆已風行海內，為治斯學者必備之書。這部《古陶文彙編》是材料的結集，也是研究的結晶。書中作為目錄的釋文，實為編者種種見解。我覺得特別值得稱道的，是態度的矜慎。中國古文字學目前正在深入發展，尤其是戰國文字這一支，在各位學者努力下取得不少新成果，也還有若干疑難留待解決，不能說已臻於成熟的境地。六十多年前王國維先生作《金文編》序，專門揭發“闕疑”之義，提倡古文字研究當用此法，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。我自己對此學得很差，每易陷於強生議論，在繹讀高明同志著作時，不禁為之汗下。

《彙編》的歲事，給編著新的陶文的字編奠下了基礎。我們熱烈盼望高明同志早日完成字編的工作，成為《彙編》

的姊妹篇，對古文字學將是又一貢獻。

李學勤

一九八七年六月

古陶文彙編序

古陶文是繼商周時代銅器、璽印、貨幣、石刻文字之後，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出現的另一分支。此一分支學科的開拓者，是山東濰縣學者陳介祺。清同治十一年（公元一八七二年），他於友人于某處得到印有「陳」的陶片，推測此「陳」當是齊國陳氏之族。從而開始搜集，不數年，所獲竟達一萬三千餘件。隨後有潘祖蔭、王懿榮、端方、周霖等競相尋求，各有所獲。此期陶文多出山東境內，皆齊邾遺物。光緒間（公元一八七五—一九〇八年），羅振玉獲易州出土陶文，撰文指出易州古陶多記陶工某某並著年月，異於東齊。

陳氏簠齋收藏陶文最富，但未刊印成書。最初選所藏四千零四十三件，用棉紙精拓，拓紙每件工本大錢二十文，全份收大錢八萬，

以傳古為重，售於同好；或取其中部分拓片貼裝成冊，即今流傳之簠齋陶文拓印本。諸如《簠齋瓦器拓本》（三十冊，六函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）、《簠齋藏陶拓本》（二十冊，四函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）、《簠齋古陶拓本》（五摺冊，二函，考古研究所藏）、《簠齋藏陶》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，八冊，一函本，又考古研究所藏，二冊，一函本）等。同為簠齋陶文，書名各異，著錄陶文內容和數量也不相同，當非同時裝訂。採用裝訂方法保存拓片，既利於流傳，又簡便易行，故為其他收藏者所模仿。據作者見聞，類似的古陶文拓印本，除陳氏外尚有四十餘種（四）。公私所藏還有未曾裝訂的零散拓片甚多。二十年前這種零散陶文拓片為各地書肆所常見，本書所錄自藏部分即作者當時購置的。

刊印陶文成專書的劉鶚為第一人。庚子戰亂，王懿榮遇難。

王氏生前所藏陶文與甲骨，均歸劉鶚。劉氏從陶文中選拓五百餘品。一九〇四年印成《鐵雲藏陶》三冊（另一冊為封泥）。十八年後，日本大田孝太郎《夢盦藏陶》一卷出版；一九三〇年，黃賓虹刊印《陶璽文字合證》；一九四三年周進所藏由孫淦、孫鼎編成《季木藏陶》出版。此四種陶文著錄，《季木藏陶》資料最富，《鐵雲藏陶》稍遜。黃氏《合證》與《夢盦藏陶》收錄拓片都很有限，四書所錄除殘去重，僅千有餘種。

陳介祺既是古陶文的發現者、收藏者，也是頗有貢獻的研究者。曾撰有《陶文釋存》與《陶器造象化布雜器考釋》等書稿，惜未刊行。他不僅識出印有陳某的陶文為戰國齊器，並指出陶文內容不外地名、官名和器名，作者用者姓名與其數（五）。這此見解都很正確，為後人研究奠定了基礎。陳氏摯友吳大澂據簠齋所

藏撰寫了多種陶文專著，也多未刊印，目前尚可找到的僅有《簠齋古陶文考釋》^{（六）}、《讀古陶文記》^{（七）}與《說文古籀補》等三種。後來丁佛言、強運開、廣續、吳書先後編輯《說文古籀補補》與《說文古籀三補》，均收錄不少古陶文。方濬益《綴遺齋彝器考釋》本係研究金文，但書內考釋陶文六十四品^{（八）}，釋文貼切，為學者信服。顧廷龍《古陶文彙錄》一九三六年刊行，顧氏集學者考釋成果於一書，是一部古陶文專用字典。因限於當時條件，正編僅錄三百九十餘字。王獻唐《鄒滕古陶文字序》、柯昌泗《季木藏陶序》、王襄《古陶殘器繫語》^{（九）}，皆為研究古陶文的專論，共同強調注意時地的差別，諸如陶文的出土地點、時代以及器物形製和文字書法。王獻唐對臨淄、鄒縣兩地陶文曾作了較為細緻的分析，他說：「臨淄、鄒縣較精，文字亦多，三四字至十數字不等，鄒似稍遜，字亦簡古，

多一字至二字，其三四字者不習觀也。」為辨別齊鄒陶文，予以很大啟示。一九三五年，唐蘭、張政烺兩位先生，同年内發表《陳常陶釜考》^(十)，與《平陵陳耳立事歲陶考證》^(十一)。唐氏根據文獻考證陶文中的「陳向」，即《史記》中的「陳常」，《左傳》哀公十四年稱「陳成子」。張氏利用銅器銘文考證陶文中的「陳耳」，即《子璋壺》、《子禾子釜》兩銘中之「陳得」，《左傳》哀公十四年杜注「陳惠子得」。這兩篇文章為如何利用陶文資料研究古史樹立了典範。說明陶文不僅是研究文字的資料，同時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。尤其是對當時官私手工業的研究，可補文獻之缺佚。陶文雖與璽印同系，從史料價值衡量，更重於璽印。王國維把它們比作甲骨文、彝銘^(十二)，並不過份。

建國以後，由於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，河南鄭州、洛陽、陝縣

登封、新鄭、新鄉、滎陽、溫縣、山西夏縣、翼縣、侯馬、山東臨淄、鄒縣、陝西岐山、扶風、鳳翔、淳化、渭南、咸陽、西安、臨潼、河北易縣、藁城、武安、江西清江、湖北雲夢等地均出土一些陶文。這些資料皆經科學發掘，出土地點和時代比較清楚，用來考覈以前非經科學發掘所得的陶文，無疑也提高了後者的史料價值。利用陶文資料研究古史，自五十年代以來，成績日益顯著，許多學者撰寫了不少重要文章。

李學勤一九五七年發表的《戰國題銘概述》^(十三)，分別對齊、燕兩國陶文進行考證和研究，用科學理論分析當時的政治和經濟，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。齊陶文中陶工記名有一種作「陶尚某」的，過去誤釋為「向」或「尚」，均不確。朱德熙根據彝銘和璽印等資料釋為「者」字，指出「陶者」就是「陶工」^(十四)，甚是精闢。再如陶文中